

Reconstructing and Exploring O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能力：重构与探究

潘鸣威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Reconstructing and Exploring O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 能力：重构与探究

潘鸣威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能力：重构与探究 / 潘鸣威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648 - 2484 - 6

I. ①多… II. ①潘… III. ①英语—口语—研究 IV. ①H31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1523 号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能力：重构与探究

潘鸣威 著

◇组稿编辑：李 阳

◇责任编辑：李永芳 江洪波

◇责任校对：蔡 晨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南省誉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5. 75

◇字数：280 千字

◇版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48 - 2484 - 6

◇定价：38. 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731. 88872256 88872636

投稿热线：0731.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序

口语交际能力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测评历来是语言测试研究者和语言教学工作所关注及研究的重点之一。口语测评大都是一种基于被试者表现的考试形式（performance-based testing），即被试者根据考试要求，完成一个或数个口语任务，然后由考官根据考生表现决定其口语能力等级。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因素会影响考生表现：首先是考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其次还有口试形式、评分标准、考官因素等。应该说，其中关键的是口语交际能力的构成（即能力构念）。然而，如何建立一个能客观、公正、全面地衡量口语交际能力的框架是语言（口语）测试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

本书在口语交际能力构建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本书的研究从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多模态视角出发，构建了口语交际能力的基本框架。该框架主要由“口语性”和“非言语特征”两大模块组成。本书的研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该框架不仅理论基础完善，丰富了现有的口语交际能力模型，而且折射出高等教育阶段英语口语教与学的薄弱环节，具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和推广意义。其中两大模块以及模块间的交互作用能真实、有效、客观地反映形成性评估中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特征，同时能体现口语基本属性中所需测评的各项内容。

本书的成果是一项高质量研究的集中反映，对进一步完善现有英语口语测评理论和实践有着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邹 申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英语专业教学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前言

本书从多模态的研究视角重新构建了口语交际能力，形成了研究学习者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基本框架，并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在此框架下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本研究回答了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第一，将多模态研究理论植入到口语交际能力之中，将如何建立研究模型？该模型的特征和解释力如何？第二，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能力模型中，本研究所反映的学习者英语口语呈现何种总体描述性特征？不同水平的学习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三，如何有效地将不同的模态进行交互研究？不同程度学习者是否在模态交互上存在差异？模态本身和模态之间交互的不同功能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口语的有效交际？

本书首先从交际能力的定义出发厘清了“何为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包括什么内容”等问题，重点回顾和分析了 Bachman (1990) 所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并以此为主要理论根基提出了本研究中口语交际能力的暂行定义：在交际语言能力模型下，通

过对口语准确性、流利性及适体性的综合考查，学习者在英语口语交际过程中通过言语与非言语渠道所反映出的能力，及其对话语管理策略和心理生理机制作用的全面表现。为了丰富交际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本研究提出从多模态的视角来分析学习者的口语交际能力，并从必要性、可行性和突破性等方面论述了如何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行为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多模态研究视角整合性地移植到口语交际能力的研究中来。

结合交际语言能力模型与多模态研究的视角，本研究提出了多模态视角下口语交际能力的研究框架，主要由“口语性”和“非言语特征”两大模块组成。这两大模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语言交际能力，也充分体现了口语的基本属性中所需测评的各项内容。在具体构成上，“口语性”模块主要包含对于“口笔语特征”以及“声调”的指标。在“口笔语特征”上，本研究借鉴了 Biber (1988) 对于口笔语特征研究的框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提出了各项语言特征的分析指标；在“声调”上，本研究借鉴 Brazil (1985, 1997) 音调系统研究中对声调的分类。“非言语特征”模块主要由“基于身体”和“基于环境”指标构成。“基于身体”的指标为“目光交流”、“手势与躯干移动”、“表情”以及“头部移动”；“环境”指标泛指一切话语环境下的物理构件，并与“基于身体”的指标存有紧密的交互。

在“口语性”模块中，本研究发现在“口笔语特征”指标上，学生口语总体趋向笔语化的特征。这些差异可能由学习者的策略能力、表达地道性以及其本身对小组讨论的参与意识有关所致。在“声调”指标上，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在各类句子声调的使用上无显著性差异。从各句子声调来看，学生在平调的使用上显得过多，表现出句子声调平缓，没有明显的起伏变化。这些与学生对小组讨论的参与意识、对声调语用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句型和声调之间的关联意识有关。

在“非言语特征”模块中，本研究发现：(1) 学生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总体上较少地使用各种能够起到意义生成作用的非言语行为，在所使用的非言语行为中存在不少的无助于信息传递的动作，这是其话语管理能力、策略

能力以及心理生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学生对于小组讨论的参与意识比较薄弱,没有将自己从真正意义上当作小组讨论的成员,而更多地将之视为单纯表述自我观点的一项任务。(2) 不同水平组学生在各项非言语行为上存在一定的显著性差异,并且不仅反映在各种非言语行为的频数上,也反映在相应的持续时间以及非言语行为时间占小组讨论总时间的比例上。这与不同水平学生本身英语学习与文化附带习得因素不无联系。(3) 学生在“手势及躯干移动”以及“表情”等非言语行为上其丰富性不够。

在模态交互方面,本书着重讨论了特殊疑问句的过少使用以及平调的过多使用问题,并讨论了学生在这两项指标上使用非言语行为的解释功能所产生的模态交互的补偿作用。在“非言语特征”与其他模态的交互上,本研究从“基于身体”的非言语表现形式出发,逐一对其中模态间交互所产生的强化以及偏离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发现各水平组的学生在模态交互中均存在偏离交互等现象。

最后本书就如何将本研究的发现运用到我国英语口语教与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了建议。对于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本研究指出应该从改进教师课堂话语,让教师在口语教学中利用更多的模态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并且在口语的课堂布置上充分地考虑到学习者与各模态之间互动的需要。在口语教材的编写上,本研究提出以平面课本教材、音频和视频光盘以及学习平台为一体的立体式教材开发,并将学习者本身的口语特征也纳入其组成部分。对英语口语测试的评分,本研究提出有必要设计动态的评分量表,特别是需要将“非言语特征”的维度纳入到区分高水平学生英语口语水平的评分量表之中。

本书作者衷心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邹申教授在全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悉心指导,并为本书撰序。同样感谢华南师范大学何安平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卫乃兴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张艳莉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刘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邓杰教授等诸位专家学者为本书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引进人才基金项目的资助,受到仲

4 | 多模态视角下的口语交际能力：重构与探究

伟合教授、温宾利教授及冯光武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在此作者深表谢意。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付梓也倾注了大量辛勤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囿于本书作者才疏学浅，浅陋自不必言，恳请海内外大方之家不吝赐教，作者不胜感激。

潘鸣威

2016 年春于白云山下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5)
第三节 本书结构	(7)
第一章 文献回顾	(9)
第一节 交际能力	(9)
第二节 学习者英语口语特征	(30)
第三节 多模态话语分析	(34)
第二章 多模态视角下口语交际能力研究的初始模型	(51)
第一节 模型总览	(51)
第二节 模型详解	(56)
第三节 模型的可操作性与解释力	(73)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问题	(76)
第一节 研究步骤及其方法	(76)
第二节 语料信息	(79)
第三节 数据处理	(88)
第四节 研究问题	(92)
第四章 初探性研究与模型验证	(94)
第一节 初探性研究	(94)

第二节 模型改良	(104)
第五章 口语性	(110)
第一节 口笔语特征	(110)
第二节 声调	(124)
第六章 非言语特征	(139)
第一节 目光交流	(140)
第二节 手势及躯干移动	(150)
第三节 表情	(162)
第四节 头部移动	(167)
第七章 模态间的交互	(173)
第一节 “口语性”模块的模态交互	(173)
第二节 “非言语特征”模块的模态交互	(177)
结 语	(199)
第一节 研究总结	(199)
第二节 研究的应用与启示	(201)
第三节 本研究的局限性	(206)
第四节 今后的研究方向	(207)
附录一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性质和目标	(208)
附录二 CLAWS7 附码集	(209)
附录三 大学英语口语考试 (CET-SET) 评分量表	(214)
参考文献	(216)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只有无书面语的语言，却没有无口语的语言。就人们掌握语言形式的顺序而言，口语先于书面语（高名凯、石安石，1983；宋振华、刘伶，1984）。第一语言的相关研究表明，人们在接受正规教育以前已掌握口语，对于书面语的掌握却要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后。据估算，在中国“约有近三亿人口在学外语”（束定芳，2005：2）。英语作为中国社会中最广泛被使用的外语，以其独特而庞大的使用人群，成为了我国专业人才与世界各国在各领域进行沟通的首选外语。英语口语能力的高低已成为学生谋得好工作的敲门砖。并且，在语言政策的层面上，我国教育部分别于2004年1月20日和2007年7月27日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稿）以及修订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特别强调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尤其是听和说的能力（详见附录一）。

国际上，语言教学界对英语口语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已取得众多卓有成效的理论成果和实证成果（如Brazil，1995；Carter和McCarthy，1997；Fernando，1996；Hagen，1995；Hughes，2002；Lynch，1996；McCarthy，1999；McClure，1995；Nunan，1989；Riggenbach，1999；Tsui，1994；Weinstein，2000；Zelman，1996等）。这给我国英语口语教学带来极大的借鉴价值及意义，使得我国英语教师以及研究者在英语口语的教与学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能对这些问题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英

语口语水平。

然而，中国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仍较为薄弱，往往与其笔语的发展不同步。社会上对大学生口语能力的批评屡见于报端。马天泽（1998：61）引用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报道，提到“该台对在沪的独资及合资企业所作的调查显示，大约有70%的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表示不满”。邵永真（转引自蔡基刚，2002a：63）进行的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近几年来毕业的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普遍感到不满意，对口语及写作能力则更为不满”。这一调查得到的数据是，用人单位认为英语口语能力强或非常强的毕业生仅为5%，而差的或极差的比例则高达37%。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口语输出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那么英语口语教与学的各环节中，哪些与以上问题息息相关呢？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以及口语教材是学生获取语言输入的重要途径；如何评价学生英语口语能力则在一定意义上对口语的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影响重大。这些环节都与学生英语口语所存在的问题联系密切。以下分别从英语口语教学、英语口语教材以及英语口语评估三个主要方面扼要地梳理我国英语口语教与学的现状。

一、英语口语教学

束定芳、庄智象（1996）以及束定芳（2004）认为，英语教学的实施有五大主要过程：需求分析、课程设计、教材开发、课堂教学以及课程评估，并指出在这些主要过程中，课堂教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首先，这是因为课程设计、大纲制定、教材开发等都还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课堂教学。英语教学目标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换言之，课堂教学实际上就是英语教学目标的具体执行过程。再者，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而言，课堂是其接受外语输入的主要场所，对部分学生而言则是唯一场所。第三，英语课堂教学不但是学生接受外语输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学生接受学习策略培训、学习行为得到评估的重要场所。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英语课堂教学的研究十分重视，对英语口语课程设置的重视程度却相对较低。在我国的大学生英语课程设置中，除某些有一定条件的院校之外，一般的高等院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只设置了精读和听力课程，并未专门开设英语口语或英语视听说等相关课程（魏晓红，2009）。

此外,不少教师仍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教学模式,往往认为仅靠课堂教学就能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值得指出的是,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需要大量的外在输入和输出实践。课堂教学时间极为有限,而且有时大部分时间被教师讲解所占用。因此,“仅靠课堂上的那点输入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输入要求的”(束定芳,2006:24)。现在所谓的口语课实际上已没有多少“说”的成分,不是学生真正在“说”,很多的时间是教师在“讲解”。这样,传统课堂教学根本无法保证学生摄入足够的语言输入,也无法保证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英语口语实践。在这种英语口语课堂中,往往气氛较为沉闷,学生的口语输入则通过教师话语的单一模态来实现,无法使学生通过一系列在真实生活场景中所发生的情景来切实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

二、英语口语教材

与以上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低效问题相类似,我国英语口语教材的质量也可谓参差不齐。应该指出,英语口语教学离不开好的口语教材。彭青龙(2000)对来自上海二十余所高校的140余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的学生认为有好的口语教材,24%至74%的学生对口语教材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教师在开展英语口语教学时也大都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受。束定芳(2004)在调查外语教材时也有类似发现,指出学生更希望通过比较轻松、有趣的方法来学习英语,愿意仅通过传统教材来学习英语的人数仅占到6%左右。

张翠萍(2001)对我国英语口语教材从内容维度上做出以下分类。第一,功能型。这类教材的出发点是交际教学法理念,强调学生的需要,培养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接触和反复运用真实的语言,逐步正确地使用英语。第二,情景型。这类教材往往是利用情景来展现语言。以情景法编写的教材以对话形式介绍新材料,强调先听后说。第三类教材则是以上两种的折中,提倡通过情景性的语言实践,学会并掌握在实际交际活动中使用语言的能力。该项研究指出,这类教材应是目前口语教材编写的趋势,但在英语口语教材市场上较为鲜见。顾曰国(2006a)对目前比较流行的网络外语教材做出过这样的分类和评价。网络教材一般呈六种基本形式:第一种为“文字+电子版”;第二种为“文字+音频材料”;第三种为“文字+视频材料”;第四种为“文字+动画材料”;第五种为讲座形式;第六种为引进版。其中

最不理想的教材当属前两种。这是因为前两种网络教材实际上是纸质教材的翻版。而目前较多大学英语教材的网络版则正是属于前两种。这样的教材只是发生物理载体的变化，没有任何新意可言，对于提高英语口语的教学效果亦无实际意义。

因此，纸质教材或是网络教材等有一共同点，即大多依靠平面的文本媒介来达到信息的传递。诚然，口语教材中也会配有一些插图及光盘等文本以外的媒介辅以色彩，但其数量相对较少，且使用率不高。这样的口语教材无法使学生对英语口语的学习产生浓厚兴趣，更无法使学生学会文本媒介以外帮助意义生成的话语策略。学生在使用英语交流时，由于在输入环节上就无此类强化，其英语口语表达则往往缺乏言语以外辅助意义生成的要素，亦无其他英语口语表达中所需的策略元素。

三、英语口语评估

国内高等教育中，英语口语评估早已被提到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是英语专业四、八级统测中，都设有独立的口语考试。此外，我国大学生中还有众多人参加国外考试机构举办的英语水平考试，其中也不乏英语口语的测试。

然而，虽然对英语口语的测评热情不减，我国大学生英语口语水准是否达到国家对大学英语口语大纲的要求呢？蔡基刚（2002a）曾转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对1999年1月至2001年5月之间大学英语考试口试（College English Test Spoken English Test，简称CET-SET）的情况总结报告指出，在累计32107位考生中，有18550人获得B等及以上的成绩，即只有57.8%的考生能用英语就较为熟悉的题材进行口头交际。“如果按照每次200万四、六级考试考生折算，其百分比极小，可见大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很差”（蔡基刚，2002b：228）。另一方面，文秋芳、吴彩霞和So（1999：34）发现，“除在讲话语速方面我国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已超过大纲要求外，其他各项都难以说明是否达到了大纲要求。”文秋芳、赵学熙和王文字（2001：8）也指出，2000年英语专业四级口试（TEM4-Oral）中存在语言准确性偏低，语言流利度不够，话语内容无新意，缺乏思维深度，对话中交际原则掌握不好等诸多问题。

很明显，以上这些问题暴露了我国大学生英语口语水平较低的普遍现象，但除通过以上测试手段所观测到的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诸多其他顽症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才可发现。由我国现有各类英语口语测试的评分量表也不难看出,绝大多数量表针对发音、语法、内容、流利程度等言语因素加以考察,如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试和英语专业四、八级口试的评分重点分别为“语言准确性和范围、话语的长短和连贯性、语言灵活性和適切性”和“语音语调、语法与词汇、有条理、灵活自如”(参见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编写的《高校英语专业四、八级口试大纲》),对交流环节的其他因素,如交际策略、非言语交际等较为忽视。

综上所述,英语口语课程设置及课堂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英语口语教材所呈现的单一化,英语口语测试与评估中所揭示以及还未凸显的问题,都迫切地呼唤研究者对英语学习者口语特征方面做深入的研究。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以上研究背景说明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的特征研究应向更为细化、更为全面并且具有理论支撑的方向迈进。本研究秉承这一理念,朝着这一目标,具有以下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质上而言,本研究从多模态视角出发,不仅重新诠释并重构口语交际能力的构念,也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学习者英语口语特征的模型,并应用该模型综合分析我国大学生英语口语的特征。因而,本研究目的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层面。本研究旨在以多模态视角重新构建口语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自“交际能力”概念提出后,众多研究人员就对“何为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有何组成”等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思考和探讨。由于学者们对交际能力构念的切入视角有所不同,因而对其理解也各行其道。从多模态角度出发去构建交际能力,特别是口语交际能力的内涵,并且反过来充分发展和丰富以往交际能力的理论研究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第二,实证层面。本研究尝试通过多模态视角下构建的学习者英语口语研究模型,并对本研究所收集的语料加以实证性描述、分析和讨论。前文的研究背景已明确指出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口语输出方面的薄弱环节。如果以本

研究模型作为主要依据，势必还可挖掘更多学生口语输出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具体观察不同程度学习者在口语输出质量上所存在的差异。此外，在实证层面，本研究还将尝试研究不同模态间的交互作用，并通过本研究的数据得到实证意义上的解释。

第三，应用层面。基于研究发现和讨论，本研究还尝试对英语口语课堂教学、英语口语教材编写以及英语口语测试等提出可借鉴的做法和建议。在应用层面，本研究将提出如何实现英语口语课堂中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Krashen, 1981, 1982, 1985）的多模态化，如何在英语口语教材的编写以及呈现方式上体现多模态化，并且如何将多模态的维度也有机的整合到英语口语测评之中，使之更有效地测量和区分学生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

二、研究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在理论层面、现实层面以及参考价值上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课程要求》提出，“说”的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要使学生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运用英语有效地开展信息交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如何评价其交流的有效性仍停留在评估者的主观判断水平上，没有统一的评估体系，很难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角度来统一地评估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此外，绝大多数的评估研究停留在对口语内容转写的基础上，无法考查与分析文本之外的信息，显露出了评估中的“盲区”。若能以多模态作为研究视角，结合语料库的研究手段，则可使教师从量的层面上对学生口语的当前水平和薄弱环节有更好的认识。因此，就理论意义而言，本研究在有机地融合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行为理论为指导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以及结合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测试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模态视角下口语交际能力的内涵和研究框架，并在相关教育计量学理论的帮助下，使之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

（二）现实意义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本研究的发现和讨论以及所提出的对英语口语教学、教材编写以及口语测试与评估的建议等都对中国高校英语口语教与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的结果也可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自己的英语口语